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稿类一士

徐一士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755

一士类稿

徐一士著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土类稿/徐一士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36-6

I. 徐… II. 中国-近代史-掌故 IV.
K25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1952号

总 编 问	陈 原	王元化	李 慎 之	任 继 愈	刘 昊	千金兰
学术指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莘芳 (传统文化书系)
	傅嘉年	黄永年			董 桥	劳祖德 (近世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 裳	董 桥	劳祖德 (近世文化书系)
	朱维铮	林 乾 爵			汪子嵩	赵一凡 (外国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敏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杜小真	林道群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少 知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 越 男		
	王之江	柳 青 松	袁 启 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周北鹤					
美术编辑	谭成前					
封面设计	陶雪华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刷 厂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 数	138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9.00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元培、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保持或不能做坏。

在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购书市场上工作，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C 422126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掉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辈，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源便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出版说明

中国有悠长的历史，而又历来注重于历史的记载，故有历史王国的称誉，综观全球，是应当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历史学中，有它派生的一门学问，叫做“掌故学”。虽然“掌故”也是历史，但与历史略有不同，在古代，历史学与掌故学并没有什么差异，以中国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史记》和其他三部著作合称为《四史》的为例，它们就生动活泼，记述人物和事迹，栩栩如生，毫无呆板死硬之感，便是说只要是合乎历史的真实，人的一举一动，官语的断崖口活，都可以入史。例如刘邦，在司马迁笔下，就活脱一个流氓皇帝，毫无后来史传的太祖高皇帝那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到了《宋史》以后，史成了国家钦定，由私家著述成为集体执笔，死板枯涩，毫无生气，照抄《起居注》、《实录》等公家文献，令人读来味同嚼蜡。所以裴注胜《三国志》、《世说》胜《晋书》，唐、宋以迄元、明、清，私家野乘，其价值远过正史。那些著作，都应该被称为“掌故”，以有别于正史。

掌故之学，虽然代有著述，不绝如缕，但是百年来由于西方科学治史的方法传入中土，掌故之学，更又辉煌一时，成为有别于历史的一种专门学科，其中最知名的学者，便是本书的作者徐一士。

徐一士（1896—？），江苏宜兴人，宛平籍，其卒年不详，大致在建国以后六十年代前后。谱名仁钰，字相甫，一士乃其笔名，遂以名世。其著作有本书及《一士谈荟》、《发愤一士随笔》（与其兄合作）、《亦佳庐笔记》、《近代笔记过眼录》等。徐一士谦逊退让，不善交际，虽著述等身，但不自收辑，上述数种，仅受友人怂恿，勉强为集，其散佚零篇，犹不知几何，未能流传后世。

徐一士的掌故文章，其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身后犹多次翻印出版，自有其特长的长处，不独与繁多的清人笔记不同，即后起之秀，亦不克与之拮据，其原因有如下列数端：

其一，以科学态度治掌故，这一点是徐一士和清人笔记最大的分野，因为徐一士学贯中西，深谙西方以科学治史的方法，并不似前人的道听途说，信口开河，他的著作一言一句，都经过缜密思考方才笔之于纸，这一点和他的同乡孟心史有相同之点。

其二，家学渊源，宜兴徐氏本为常州的世家大族，他的伯父徐致靖（子静）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从兄徐仁铸又是戊戌之前在湖南学政任上和陈宝箴缜密合作先作改革试验田的要角，政变失败后，徐致靖俸免于难，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父子共同命运。徐氏父子回乡闲居，正好给那时年还幼少的徐一士以最好秉父学习的机会。徐一士在伯父和从兄的薰导指点下，他从小便学到旁人所无法学到的知识，所以他的著作以晚清这一时期为最多。再加上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读遍他伯父、从兄的所有藏书，所以他的掌故之学，独步一代，无人可与之比拟。

其三，徐一士谦逊退让，声华不露，似可说学胜于才，他的文章不算惊才绝艳，而可说平淡如水，绝少波涛起伏，但却以平淡胜人，所引史实，多经仔细执梳，无一字无来历，即一标点之微，也做到准确无误。这一点不但在当时书刊上极为罕见，即在今天，也很少人能做到。

建国以后，本书迭经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重印，但多根据当时情势，颇多任意改动之处，断句标点谬误地方亦到处可见，颇受人诟病。本书的排印，系根据四十年代最初版本，仅于明显错误之处予以校勘改正，使之成为徐先生著作较善的一个版本。

瞿序

徐一士先生最近就他的历年撰述摘编一部《一士类稿》，要我作一篇序，这是极荣幸而且极有意义之事。

因徐先生的文章而想到，所谓掌故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当先加以讨论。我以为中国正史与杂史的分途自宋始。我们读《史记》、《汉书》，觉得史家叙述一个重要人物每从一二节上描写，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于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即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故的发生前后经过着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以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于心。例如《史记》写酈食其功立六国后张良谏止一事，酈食其的话是有理由的，而张良的话举不出理由。但看他入见高祖时的偶然事态，以及仓卒伺借着代筹的神情，挽回千钧一发的局势就在他临机应变的几句话。可知当时彼此间的微妙心理。这样关系千古治乱的大事，就是这样谈谐似的被决定了。所以不但高祖与张良两个人的个性暴露无遗，而且可以将当时主张恢复封建与主张沿袭秦制的两派人心事和盘托出。司马氏之所以为良史，正在这些地方。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笔之人多少有一点公务的史职在身，而后代的文网较为苛密，加之私家的传说太多，不是公认的话不敢说，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据，因此虽然极好的史裁也受了限制，不能像《史记》那样活泼泼地了。不过唐以前的史家虽或不能尽情发挥，犹能于剪裁去取之间示其微意，使后人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例如陈寿《三国志》记高贵乡公讨司马昭一事，在《本纪》里面一字不提，而但载太后令及大将军上言，便是明明告诉后人这两篇文章是一种掩饰之词，更足见高贵

乡公之为冤死。所以照这样看来，后世史家所依据之官史史料竟多难于置信。愈是史料完全的愈恐难于置信，若是并完全史料而无之，则更不用说了。良史之苦心，不是细心体会，又有谁知道呢。

有许多的史料不是史家所能亲眼看得到的，这种史料不知埋没掉多少而成为千余年的灰烬尘土了。《文选》载陆机吊魏武帝文一篇，自云元康年中游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据其所采用者而观之，则当时史臣所收录者不但是——篇口传的令，而且将弥留顾命时的情形也都记了下来，甚至关于遗令的事后情形也都有一贯的记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当其大渐时的首语，必不赖自己动笔作书，而必是尽心的侍臣据实笔录以供他日参考。而所说的话又不是都可以公开以示四方的，所以只可存于秘阁，而成为一种秘密文献。这一段纪载显示曹操的真性情以及其私人生活家庭状态之一斑，较之任何纪载更有价值，而陈寿作《三国志》时竟未采入。不知是未曾检阅到这件档案呢，还是认为无关于政治而略去不载。总而言之，不能不说史家对于史料之去取虽良史不免有失当的地方。

正史杂史之分途，也可以说就从《三国志》启其端。《三国志》固以文笔简洁见长，而叙写事实亦不免有简略之失，为后世官修史书之徒以勾勒轮廓为尽职的开一先路。至于杂史之多，也就起于三国。因为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处的纪载不同，有本处的事非本处不能知的，有甲处的事自己纪载不详而转见于乙处丙处的。其时宣传与反宣传的工作都很利害。例如《曹瞒传》是吴国人作来骂曹操的，我们知道他有作用，不敢十分相信，然而多少可以看出曹操之为人。又如陈群、华歆、王朗一般人寄书与诸葛亮，明明是代魏国劝降的文字，然而可以反映当时的中原士大夫对于流亡在西南者之一同同情。推而至于一切琐屑的逸闻佚事，都有其涵之意义。所以陈寿不采而裴松之采以为注，现在拿裴注与陈志合看，觉得有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的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杂史之不可废有如此。

自来成功者之纪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纪载又每至于湮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如三国事实之见于裴注所收，已经极不容易，这是因为三国鼎峙次第灭亡，到了晋武平吴，回顾汉末以来之史事，其同恩怨已经消泯，没有很多避忌，所以才能如此。且私家纪载忌不容易流传久远，尤其在刻书之风未盛之时，零篇断简，靠着传钞，最难持久。但看司马光修《通鉴》，所采唐及五代之事实见于杂史者多半无传本，足见采摭群书是一种极可贵的著述事业。然而这些杂史若一种种单独看来，大都不免彼此抵牾而生出疑问，又须加以抉择比较审慎而存录之。所以裴氏《三国志注》与司马氏《通鉴考异》为功于史学真不小。

唐人修晋以后的史，很喜欢采录故事，往往琐屑至于类似笑谈。前人颇有不以为然的。这诚然不是史的正数。然而史家得不着更好的材料，又将如之何呢。就是以故事为史，也还可以看见一时的社会风俗时代心理，这也不是无益的呀。自宋以后，私家的碑传文字盛行，于是一个人的仕履世系官论著述倒可以了如指掌，而其人之性情好尚以及其行事之实迹往往不能窥见。于是宋以后之史多是钞录些读墓之文，一传之中照例是某某、字某某、某处人、某科出身，历官某职、某事上疏如何、某年卒、著某书、子某某，几乎成了一种公式，千篇一律，生气全无。这样的史还能算史么？

宋以后的史是必须连同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之流读的。不但是事的曲折隐微，人的性情风格，在正史几乎全找不着。就是政治社会制度之实际状况，也必须靠着另外的书来说明。譬如宋元丰之改官制前后种种，在正史上只能知道一个大概。至于究竟怎样运用的，读了施元美《文昌杂录》、洪迈《容斋随笔》，方才能知道得多一点。

照史例的原则说来，纪传体是以人为纲的史，编年体是以时代为纲的史，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为纲的史，通典体是以制度门类为纲的史。严格的注重体例组织，则详于此必略于彼，若要打破这个藩篱，将四者通而为一，则必须另有一种新的史裁，融会前人之长，为后人辟一途

径。这是现在尚办不到的。为救济史载之拘束以帮助读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则所谓掌故之学兴焉。

掌故之学究竟是什么呢？下定义殊不容易。但从大体说来，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要达到这种目的，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系渊源师友亲族的各种关系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琐碎资料具有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这种条件，本来是治史者所当同具。但是所谓掌故学者每被人看作只是胸中装有无数故事的人，则掌故之学便失去真价值，所以既称治掌故，则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然而仅有方法而无实践的经验，也是不行的。中国的社会本来是由于亲族乡党举主故吏座主门生同年同学乃至部曲宾客种种关系错综而成。六朝人讲究谱学，但能将这本帐记在心中，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技能，后世的人事更加复杂，一本帐也记不清楚，必须会合无数本帐方能足用。最好是一生致力于此，若仅恃临时检阅，岂能得当。所以掌故学者之职务，乃是治史者所不能离手的一部活词典。

寻常的解释又以为掌故之学即是典章制度，这种解释自然不是全无理由。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识，尤其需要实践的经验，许多书策上关于典章制度之记载，因为名物之变迁，习惯之变迁，每不易于索解。宋初的人为了一个入阁仪的讨论，费了无数唇舌。考其经过乃是因为唐朝的入阁是便殿召对的一种简单的仪礼，后来连这简单仪礼也变成稀有的事，因之入阁仪反成朝仪之正了。同一入阁，在某时期是这么一回事，过了这个时期又另是一回事了。这还是名物具在的说法，若在明、清两代则并名物也不是了，苟非博通书史而又能以后来的习惯参较而推测之，又安能了然于胸中。宋朝的许多制度，元朝人已经不得其解，元朝的制度，我们也很多不得其解，就是清朝的制度，虽然老辈还在，也有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凡是书策上所不见的，将来必至终古无传。而书策所已载的，也还恃后起之疏通证明，方

得其用。

即以彰彰于书策者而论，比如侍郎一官，汉朝人所谓官不过侍郎，断不是唐朝的侍郎，这是有历史常识的都知道了的。唐朝的侍郎又与宋元丰以前的侍郎不同，宋初的六部侍郎不管本部的事。而明、清的侍郎又与宋的侍郎不同，宋的尚书、侍郎都算从官，少有参与政务的机会，明、清的尚书、侍郎则均成为共同处理政务之一员。至于民国各部的次长，虽与清朝的侍郎近似，实际上亦尚有分别。次长是部中次官，而侍郎则虽名为卿贰，实在与尚书同为一部的长官（部中同称为堂官）。这些都是易于混淆的地方。所贵于掌故之学者，就在能把握其意义而因之豁然贯通，不至于史事有误解。

治近代掌故学之资源，所谓笔记一类书占大部分。明代这种书较多，而传于今者也有限。清代的名著如王士禛《池北偶谈》、刘廷玑《在园杂识》、查慎行《人海记》、王应奎《柳南随笔》、赵翼《陔馀丛考》、阮葵生《茶余客话》、昭桂《啸亭杂录》、英和《恩福堂笔记》、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梁章钜《归田琐记》、陆以湜《冷庐杂识》、周寿昌《思益堂日札》、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他们多半生当文网严密之时，下笔不敢不慎重，所以大致没有什么无稽之谈。而且他们所处的地位又多是便于考究朝章国故之类的，所以记事立言大都能不悖于著述之例，决不是泛泛传闻可比。在这几点上是后人胜于前人的事情。加以耳目较近，研究起来易感兴趣而且易于着手。按春秋三世之义，所见所闻所传闻，递远则递略，愈近则愈详，然则治掌故必从清代始，这是极自然的。有清末叶文字之禁骤然失效，从前因着不敢说的一切历史上疑案渐都成为好事者之谈助，于是说佚闻的纷然而起。数十年来私家刊行的专著，以及散见于报章杂志、一鳞片羽不胫而走者，不可胜数。人人感觉兴趣，遂成一时风尚，至今还是方兴未艾。

如果将这些书的内容分析起来，则大概不外乎三类：一是记制度风俗的变迁或是记某种特殊制度风俗；一是记某人的事迹或是关于某

人的佚话；一是记某事的经过或是关于某事的特点。此外固然还有，而直接有关于史学者如此而已。这些书大半是拿零显的材料随意写来以资谈助，最普通的缺点是不曾注明出处，所以材料的正确程度大都不易于断定。

至于正经谈到掌故，则有必须注意的以下几点：

第一是作者的问题。寻常人的见解以为凡是身历其境的必然正确，这诚然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但是据以往的种种经验看来，实不尽然。著者本身如果与本事有关，则其下笔或不免以下三种意义：一因恩怨而淆乱是非；一因醉谤而加以饰词；一因表襮而多加渲染，三者有一于此，即不能视为正确。唐人关于李、牛之纪载，宋人关于熙宁、元祐及洛、蜀之纪载（实则宋人一切纪载都不能说无作用），其例比比，无须征引。稍有史学常识者也都知道。愈到近代，著书之方法愈工，掩饰变乱之技巧愈进步，意在彼而言在此的不可胜道。其内容所涵之意义，决不是疏浅的读者所能窥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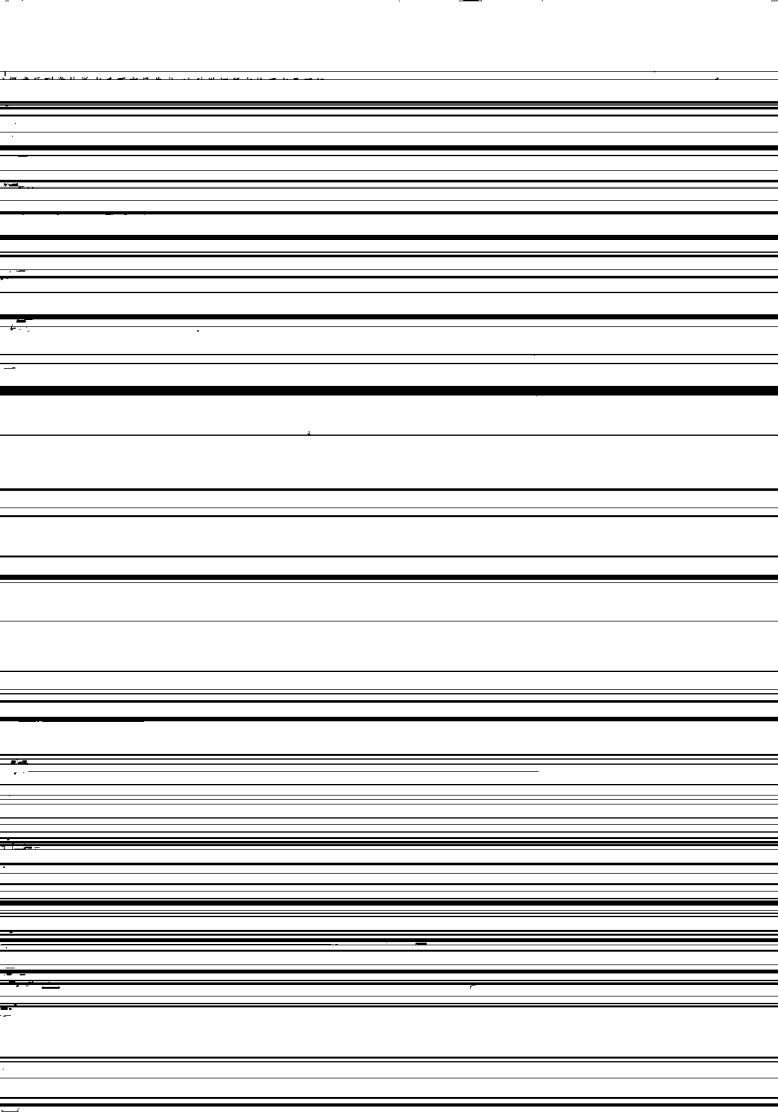
第二是时代的问题。以同时人记同时事，虽然其动机能影响其正确程度，但是舍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依据呢？我们无论如何也只取其比较可信而已。可是要知道同一亲历其境之人，其所纪述是否不错，还大有分别。就以我们设身处境而论，亲历的事，虽然其情景大致尚在心目，而事实发生之前后当时在场之人物未必能一一记忆真确。动笔的人如不细心推敲，则信笔所至必不免错误。这是确有证据的。《通鉴考异》于晋天福四年下云：“五代士人搜集图书多不究旧文，出于记忆及传闻，虽本国近事亦有抵牾者。”不经《通鉴考异》之考订，读者又何从一望而知其错误呢？

第三是著述能力的问题。同一记事而有工拙之不同，工于记事的能把握一事的中心，自然易得其真象。不然则所记者皆枝叶零星，而离事实愈远。近人每以为就某一个有名的人作一番问答，便可得到些掌故。譬如赛金花的前生就很有人喜欢向她打听她的身世，笔录下来，便成好材料。殊不知赛金花这样的人不是真能谈“天宝遗事”的

人，倘竟以她的信口所谈为根据，则未免离题远矣。著作的高低不仅在秉笔之人，也要看他所从听受的人是否够得上供给良好的著作材料。

第四是文字正误的问题。文字上少了小小的一画，便可以引起意外的误会。西洋人记明末的中国海上英雄 Limafong 在吕宋与西班牙人战争的事，从前中国的译者因其原文于 m 与 a 之间未曾隔断一小画，遂误译为李马奔。而不知方志中国赫然有林凤之名也（闽、广人多于名上加阿字，故人称之为林阿凤，而西人译其音如此，又粤语林字为闭口音，故读为 Lim 而非 Lin）。又如根据西文记载而言台湾史事的，谓清初有“高显楷”其人占领台湾奉明正朔。按其事乃是郑成功，郑曾蒙赐姓朱，故其部下称之为国姓爷，由音译译回，乃使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变为面生可疑的“高显楷”了。两事相类，姑举以为一种特例。至于寻常文字上的舛错，更是往往而有。凡于文数字之类，下笔最易致误，在下笔者出于无心，而考证者遂费无穷唇舌矣。向来考据家都说碑板可以证史文之阙误，诚然这是常有的事，但是必以碑板所有均可补史之阙，碑板与史不同均可正史之误，那也是很危险的。（大概碑志往往根据本家的行状，而行状或出于子弟仓卒撰成，甚或巧人代撰，其不符事实者每不暇详究。又近代习气专以文词为重，并不求其成为信史，故碑志更不可深恃。）以我个人所经历，碑板之误倒有出人意外的，所以误不误须就多數的记载加以鉴别，而不能凭单文孤证。

所以严格的谈掌故，往往将其所记之事与其时其地其人参互钩考起来而发现彼此之间有无数的扞格矛盾。然则这种记事竟绝对不容其存在了么，却又不然。知道他致误的病根而去其误，再从其他方面以证其所余之真，则又不但通此一事而且可因此会通许多事。在掌故学者看来，可有不可信的材料，而没有不可用的材料。乃至平凡而零碎的片纸只字，都是很可宝贵，在某种适当的地方，必有用的。这真需要老吏断狱的能力，头脑要冷静，记忆要丰富，心思要灵活，眼光要敏锐，不以辨证为目的而却能尽辨证之用，这才是所需要的掌故学者。





免想到他的笔记丛稿，恐怕日久散失，未免可惜，于是极力怂恿他早些整理出来，设法先行出版，这话也说了几年了，直至最近方有成议，居然第一部的《一士类稿》可以出书了，出书之后，必能风行一时，不消说得。我所愿在这里唤起读者注意的，则有以下几点。第一请看他所运用的材料，有许多已经不容易看见的，或是手迹，或是孤本，在当时都是各方面送来借来抄来的，而藏有这些手迹孤本的人，亦必极愿使他能以长久公之于世，所以这部书之出版，不仅是徐君个人之幸，也是多数人所引以为幸的。第二请看他的选材，真合于所谓无一字无来历一句话，决不曾有一条不注明出处，不但著述的体裁理应如此，而且徐君之心重在存公是非，而并不是欲成一家之言，其微意亦可概见。第三请看他的严正公平态度，个人恩怨固不消说绝对没有。就是有所抑扬，也必先有一番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的手续。实在是众恶的了，也只有哀矜毋喜而决无投井下石。像这样的谈掌故，真可以成为绝学而信今传后了。最后论到文字上的技术，也有他的特长。他所写的各稿，行文不事华藻而措词善合分寸，文从字顺，看似平易，却是下字均有斤两，虽喜考证，而笔端不流于沉闷枯燥，仍有含毫澹然之致。不多发议论，而衡断则甚精核，耐人寻绎，大凡繁征博引，往往照顾难周，他却能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处处顾到，左右逢源，妥适周匝，头绪虽多，而组织严密，条理秩然。有时也纵笔题外如所谓“跑野马”者，然若六辔之在手，操纵自如，归缩仍在题中，绝无散漫脱节的毛病。至如涉笔成趣，也每有之，皆能出以自然，余味曲包，而又保持文格，不落鄙俚。率率诸稿，略如上述。文字技术与学识经验相辅相得，以成其作风。他对于作品的责任心极重，所以字句上每煞费推敲，读者若不留心，或者但觉其平易，以为写来不甚费力，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也。诚然有时很像只是抄录的工作，但决不为读者所嫌恶，反觉引人入胜，读之惟恐纸尽，不是材料与技巧两样都臻绝选，何能如此！

我还敢大胆的说，徐君这部书出版以后，或者分批出版以后，其中所征引的书有许多已经极不易得见而又是读者所极渴想的，恐怕要依